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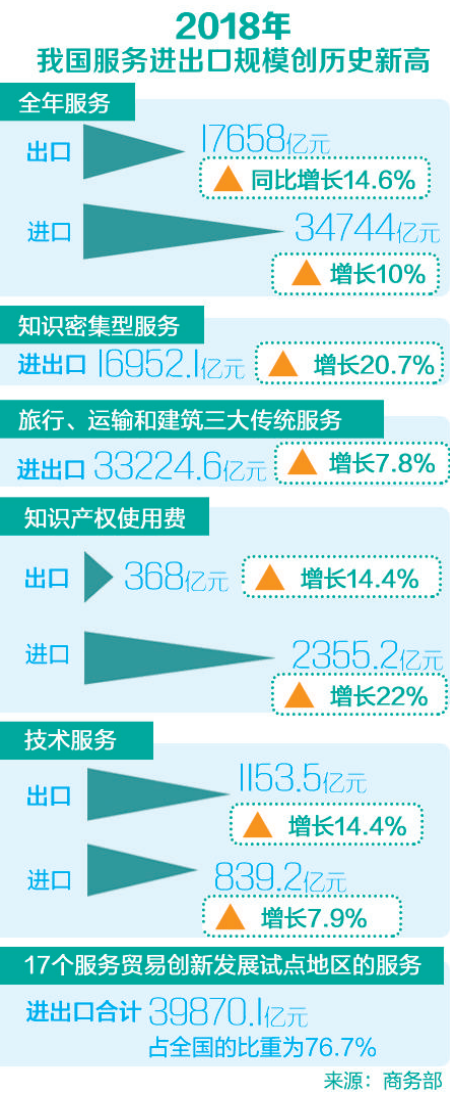
服务外包产业创新发展要有新思路

□ 王晓红

“调查研究”

本世纪以来,我国承接以服务外包为重点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全球离岸服务外包第二大目的地。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新兴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服务业开放和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正处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并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机遇期。但也必须看到,世界各国争相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全球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内外部诸多因素都对我国更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带来压力和挑战。对此,需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服务外包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服务外包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和融合化发展,构建在岸与离岸互动、东中西部融合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新格局。



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

□ 张公胤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一个重要载体。大力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切实推动其更好发展,应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具有人力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等特征,其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生力军和新动能。科技型中小企业也是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这些企业汇聚了创新要素,促进了科技创新资源的流动,可有效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近几年,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较快,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比如,科技研发方向不准确、科技成果与企业需要衔接不顺畅;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人才流动仍面临一些体制障碍;融资难,融资渠道窄;创业创新创造平台重复雷同、量多质差等,这些问题都制约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如何进

一步优化和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可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发力:

多措并举力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是更好推动科技研发与企业需要对接,使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常态化,既提升科研方向的准确性,又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二是完善和落实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充分考虑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等方面的问题,形成多方激励相容的格局。明确界定科技成果的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使科技成果开发者有持续稳定的收益预期,最大限度地激发开发者的转化热情。三是要完善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积极推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评估、定价和交易,完善专利资助政策,优化财政资助结构。四是积极搭建科技成果的流通平台。加大力度建设一批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将科技成果的供给和需求按专业领域建立数据库。

全面提升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才,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推动服务全球化与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也是新兴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式。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加速服务要素全球流动,促进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加速全球价值链分解、重构与优化,促进全球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优

产业总体态势良好 规模和水平显著提升

领域发展。

三是服务外包企业实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较快增长,大中型企业实力明显增强,民营企业成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同时,服务外包企业的标准化、国际化水平及技术创新能力、综合服务能力明显提升,逐步由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提供单一技术服务向提供综合服务转变,由承接单一项目向与发包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转变。

四是形成面向全球的多元化市场布局。我国承接的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来源从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香港四大传统市场已经拓展到东南亚、大洋洲、中东、拉美和非洲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

薄弱环节值得重视

近年来,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力成本及融资、土地、资金、交通、通信、水电、税收等要素成本全面快速上升。仅人力成本在服务外包企业总成本中就占60%至70%。2010年以来,服务外包企业逐渐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向西安、武汉、成都等二三线城市转移,但目前二三线城市的成本优势也逐渐减弱。这些因素都将导致离岸外包向印度、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综合成本上升使得许多外包企业负担较重,虽然营业收入有所增长,但利润呈下滑态势,影响了企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中高端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中高端人才缺口较大严重影响了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能力,尤其是影响了承接高

产业生态。注重发挥领军企业在接包、品牌、创新、标准、网络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打造中国服务外包整体品牌,逐步建立大型外包企业向中小外包企业分包的协作机制;借力外向企业发展的带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跨国公司的信息技术、研发设计、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物流供应链管理、财务结算、专业咨询等服务机构进入我国,提供高品质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税费和企业综合成本。

第三,以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化为目标,加快服务外包人才体系建设;注重发挥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支持院校设置服务外包相关专业;建立创新创业创造和技能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培训机制,发挥服务外包企业、培训基地、培训学院的作用,形成岗前培训、岗位培训、委托培训、定制培训、线上线下培训等多样化模式;不断完善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和激励机制。

化全球创新链布局,推动创新全球化;推动后发国家产业升级等诸多方面。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不断加快、创新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数字经济引领的全球新兴产业革命正在加速发展,为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和技术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空间。

五是吸纳高端人才就业能力增强,人才素质不断提升。服务外包产业人才结构以大学生为主,并不断向高端化发展。同时,服务外包培训规模不断扩大,并形成了以外包企业、培训机构、职业学院为主体的人才培训体系。

此外,从国内区位布局上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城市,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之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工关系和融合发展态势。“一线接单,二三线交付”的产业链布局已经形成,有力促进了中西部地区根据当地资源禀赋更好参与价值链分工,提升了中西部开放型经济水平。

端价值链业务的竞争力,这一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成为困扰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高精尖人才培养渠道狭窄、企业待遇不高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弱等,都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比较薄弱。目前全国服务外包平台建设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技术研发、信息服务、市场交易、大数据、云计算等平台建设不完善,导致难以实现资源共享;行业协会在国际市场中缺乏影响力,导致我国在国际市场推介服务外包企业、树立服务外包品牌缺乏力度;行业标准制定不完善,服务外包企业的服务标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此外,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也是制约国际发包商继续扩大在中国业务的原因之一。

第四,以在岸促离岸,推动国际国内服务外包市场融合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大幅萎缩,一批外包企业把重点转移到了在岸业务,增强了规模效益和实力,由此带动了国际外包业务的发展。我国在岸市场规模巨大,为服务外包企业夯实基础、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引导鼓励外包企业服务国内市场,培育一批专业化、品牌化的优质服务供应商,为更好承接离岸外包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向拓展的全球市场战略布局。目前,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工业化和信息化初期阶段,对于服务外包产生了大量需求。加快“一带一路”沿线服务外包市场布局,是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空间,进而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和品牌“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应在继续保持传统发包市场主导地位的同时,稳步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撷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孙飞提出:

用好政府投资基金

厘清五个基本问题

受经济、行业大环境影响,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快速发展之后,正在进入一轮“调整期”。当前存在的募资难、投资难、基金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与部分政府投资基金主体对相关概念和内涵认识不清晰、发展定位不准确有较大关系。进一步促进我国政府投资基金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其助力产业发展等政策目标,需从源头上厘清五个基本问题:

一是政府投资基金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而不是政策目标本身。近年来,各地政府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但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忽视了政府投资基金作为“政策工具”的身份定位,错误地将设立政府投资基金本身作为发展目标。应该看到,发展政府投资基金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其对企业融资、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助推、带动作用,实现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等既定政策目标,应避免未做好政策设计就盲目实践。

二是政府投资基金杠杆作用的发挥要适度。政府投资基金的出现使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由直接补贴转为基金化运作,从1:1的资金投入发展为多倍资金放大,大大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这本是政府投资基金的重要优势之一,却在实践中异化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障碍。有的地方片面追求高杠杆,难免导致“引导”异化为“被引导”,失去主动权。建议对于一般性政府投资基金可以遵循基金管理规律,依据各地经济环境等实际情况设定放大比例。

三是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落脚点在产业。政府投资基金的产生是财政、金融、产业等多种政策综合创新的结果,不能孤立、片面地从某一个视角出发考虑其发展问题。其中,财政视角关注的是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运作效率;金融视角关注其金融产品的属性,包括募资、管理、投资、退出、营利能力等;产业视角则关注其是否实现了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等政策目标。发展政府投资基金离不开各领域政策的协调配合,但其落脚点一定在产业,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四是政府投资基金应有合理规模。当前,一些欠发达区县由于项目少、金融环境差,部分基金只空有目标募资额的架子,根本无法实现募资,造成财政资金和人力物力浪费。建议各地在发展政府投资基金时要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和项目资源等实际情况确定合理基金数量和规模目标,不宜盲目跟风。

五是政府投资基金应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当前,各地政府投资基金存在同质化现象。政府投资基金的发展应紧密围绕当地产业结构和产业优势确定政策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选择管理团队、设计运营模式、制定管理机制、限定投资领域等。同时,还应统筹考虑当地金融环境、财政税收政策等,通过形成合力实现既定目标。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谷成提出:

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生产要素。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全面面临的挑战,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型增长越来越不可持续,如何实现增长动能转换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推动农业前沿技术进步。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为目标,选择了一条以现代高品种、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和现代化学投入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进步路径。新形势下,农业由以单产高产为导向的数量型发展阶段,转向以品质质量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应逐渐向资源节约型技术与劳动节约型技术并重的方向发展,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农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

二是提升农业技术效率。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活体,农业技术在进行转移或扩散时,需加强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研究和基础设施的改良等,这有赖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新形势下,要重点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难题,坚持农技推广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建立健全以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科研教学单位、社会化服务组织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广泛参与的“一主多元”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三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所具有和运用的科学文化知识、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健康及劳动者的地理分布等,其投资主要通过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和职业迁徙来进行。在这方面,应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快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建立健全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等。

四是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乡村振兴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有关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体制机制创新等。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县城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农村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等。

五是实现绿色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除了要求资源节约外,还要求具备环境友好的特征,最大限度地减轻农业生产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实践中,需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扩大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实施乡村绿化美化行动等,更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肖伟)